

闽

南

文

化

资

料

书

MIN NAN WEN HUA ZI LIAO CONG SHU

闽歌甲集

MIN GE JIA JI

谢云声编撰

闽南文化资料丛书



闽歌甲集

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朱声 编

藏书章

厦门市闽南文化研究所

《闽南文化资料丛书》总序

闽南文化是指以闽南方言为其最基本特征，产生于福建漳、泉、厦闽南地区，流传于闽南、台湾、东南亚闽籍华人聚居地的地方文化。闽南文化也有人称之为“闽台文化”、“河洛文化”、“福佬文化”和“闽南方言文化”。

闽南原本居住的是古百越族。晋永嘉年间中原汉族开始大批移民闽南。以后，唐总章年间陈元光父子开漳，唐末王潮、王审知开闽，又带来大批中原汉族。中原这三次大移民，带来了大量的中原文化，尤其是陈元光、王审知又掌握了闽南的权，对中原文化在闽南的推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闽南文化，正是在从晋到唐播传入闽的中原文化的基础上孕育起来的。

当然，在开发闽南的过程中，包括在征服平定所谓“蛮獠”，即闽越土著的过程中，不可能不受到闽越文化的影响，不可能不汲取其文化的营养。比如闽越人对海洋的知识，对闽南气候、物产的知识等等。这样，在尽心留存中原文化的同时，便开始了细微的变异。因此，应该说闽越文化是使北方来的中原文化产生变异，并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闽南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新的地理环境带来

的新情况不能不影响文化的变迁发展。

五代虽然只有几十年,对闽南文化的形成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原割据争战,福建偏安东南,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又大力发展了对南洋的海外贸易,财力大增。当时相继统治闽南的王审圭父子、留从效、陈洪进三个集团,将闽南变为一个独立的政治、经济区域,避开了兵祸,发展了生产和海上贸易,使闽南的经济获得巨大的发展。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闽南文化在留存中原文化、融汇闽越文化及吸纳南洋文化的基础上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首先是闽南方言。一方面,由于安定的环境,闽南较好地留存了上古中原汉语至隋唐中古汉语的语音,主要以中古隋唐中原汉语语音为主。另一方面中原则由于北方各族的入侵、混战、融合,中原汉语至宋代已演变为宋音,与隋唐语音,尤其与晋代中原语音有了较大的差异。再加上闽南方言又吸收了一些闽越族的语音,在同海外诸岛国交往中,也必然会产生一些新的语汇和吸收一些外来语汇、语音。这样,从晋开始,经过隋唐五代,终于演化发展而形成闽南方言。闽南方言的形成,对闽南方言艺术和口传文学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然,也对闽南文化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其次是闽南物质生活文化的形成。在闽南这

个地理环境,饮食习惯、建筑风格、交通工具、衣着服饰等等,这些中原迁来的移民不能不有所改变、有所适应,并在历经千百年之后,终于形成独具特色的体系。

民俗本来就是因地制宜,闽南特殊的地理环境,其民风民俗自然形成了许多独特之处。既有从北方中原带来的习俗,更有在新的环境中产生的民俗。如祈风之俗,便是因远洋外贸而兴起的民俗。象至今尚存的“送顺风”、“脱草鞋”之俗,当也是在那对外交通发达的时期应运而生的。总之,到此时,闽南已经产生了许多独特的民俗。

佛教的兴盛带来了许多佛事,也就带来了迎神赛会的阵头,推动了民间歌舞、游艺的兴起。在闽南音乐中,如南曲里,就有许多佛曲。至于对建筑艺术、雕塑艺术等等的推动,就更不用说了。

如果说有唐一代,闽南文化还在不断汲取中原文化的营养,而尚未完全成型,那么,经过五代这一重要的发展时期,闽南文化已经是完全成熟了。

闽南文化的大发展乃至走向鼎盛是在宋代,同泉州刺桐港的兴盛,并逐步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是基本同步的。

宋代,闽南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很快,特别是茶叶、荔枝、甘蔗、棉花和“占城稻”等的种植面积大为发展,造船、制瓷、丝织、五金、食品等业更有

长足的进步。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对外贸易自然也获极大的发展。

北宋中期,当时闽南的中心泉州已经发展为全国六大都市之一,而对外贸易也仅次于广州。泉州开港不到40年,宋王朝被迫放弃北方,偏安东南,在临安重建南宋小朝廷,整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随之南移。这时北方的陆路通商濒于断绝,东南海上则畅通无阻,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这就是所谓的“海上丝绸之路”(实际上是“陶瓷之路”)。东西方贸易中心路线,已从陆地转移到海上,宋代的陶瓷,成为连结东西方的主要媒介。而泉州距首都临安比之广州要近一半的路,又是宋王朝南外宗正司所在之地。泉州的外贸并已成为南宋财政重要来源。宝庆元年(1225年)赵汝适在泉州提举市舶司,写了《诸蕃记》,记录了当时与泉州有贸易交往的58个海外国家的情况。可见当时泉州经济贸易的发达繁荣。到了宋、元之交,泉州港已超过广州,与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二个最大的港口。

在这样的背景下,闽南文化获得飞跃的发展。在经济政治地位大大提高的情况下,闽南人充满了自豪和自信,表现出高度的想象力和创造精神,完成了许多史无前例的伟大工程,创造了许多灿烂的文化业绩,写下了闽南文化璀璨夺目的一页。如泉州的洛阳桥、安平桥、东西塔,以及高超的造船技术、航海技术等等。

这些伟大的创造，至今依然照耀后世，并已成为中华文化的骄傲。透过这些创造，我们可以看到闽南文化最为闪光耀眼的精神。

尤应值得一提的是，集北宋以来理学和孔子以下思想文化之大成的朱熹，24岁时初出茅庐，即于绍兴21年（1151年）首仕同安县主簿达5年之久。其间在闽南各地讲学、旅游，对闽南的文化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也有人认为闽南可以说是“朱子学”的开宗圣地。

再如香火延续至今的妈祖、保生大帝等民间信仰，都创始于宋代。

总之，由闽南方言、方言艺术、口传文学、民俗、民间信仰、民间技艺、民间医药、物质生活文化等构成的闽南文化总体格局，至宋代基本定型。其后的发展固然有一些变迁和创造，但都未脱离这个总体格局的大框架。

元代，泉州港虽然获得更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港口，其海上交通与经济发展也达到了最高峰。但是，元蒙统治者实行的军事专制和严厉的民族歧视政策，使闽南文化不但没有与经济再同步发展，反而遭到很大的摧残。不过，大量的外来文化，也给闽南文化注入了新的因素，使其更具开放性。元亡之后，居住在泉州的大批外族人隐姓埋名流散闽南各地，并逐渐与汉族通婚，从汉俗，同时也将其本身的文化融汇于闽南

文化之中,使闽南文化获得了新的营养。

明成化后,闽南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尖锐,往台湾、南洋拓垦的人日益增多。17世纪20年代末,郑芝龙招募闽南数万灾民围垦台湾,这是汉族大规模开垦台湾的开始。其中绝大多数为闽南人。这样,也就把闽南文化大规模地播传台湾。17世纪60年代初郑成功收复台湾,郑氏父子统治台湾23年,郑军多为闽南子弟兵,闽南文化更深入地播传台湾。

康熙二十二年,施琅复台。台湾隶福建省,设一府三县。虽然清政府有禁止渡台之令,但闽粤沿海居民却自发地不断偷渡,而且持续二百多年未曾停止。使台湾人口到1893年达到近三百万。而其中的百分之八十几是闽南人。这样闽南文化就很自然地播迁到全台湾。

另一方面,闽南人自明、清至民国,始终不断下南洋,“做番客”,或者被骗去当“猪仔”。他们主要聚居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据《南洋年鉴》(1951年)的资料,闽南华侨占菲律宾华侨的85%、印尼华侨的46%、新加坡华侨的39.6%、马来西亚华侨的31.6%^①。这样,闽南文化很自然的也就传播到东南亚这些闽南华侨华裔的聚居地。于是形成了以闽南方言为其最基本特征,涵盖闽南、台湾和东南亚闽籍华侨、华裔聚居地的闽南文化区域。

作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一个子系统，闽南文化的内涵同样十分广博。文化是人的生命活动发展的特殊方式，人针对自然创造了物质文化，针对社会创造了制度文化，针对人自身创造了精神文化。广义的文化，大致就包含了这三个层面。

在任何文化模式中，首先接触到的，当然是物质文化。闽南文化在物质文化层面上，与中华文化中的汉文化基本一致，着汉装，用碗筷吃饭，以稻米为主食等等。与此同时又具有自己的特色，八大菜系中闽菜就不同于川菜、淮扬菜。闽菜中的闽南菜与福州菜又有诸多不同。再如建筑，骑楼为北方所没有；闽南的石砌大厝更不同于客家的土楼。早年闽南的海船称为“福船”，独树一帜，名闻海外。还有闽南民间工艺，从竹编、石雕到德化瓷，数不胜数。可见，闽南的物质生活文化是非常丰富并富有特色的。

在制度文化层里不仅包含了制度，而且包含了制定维护这些制度的机构，并且还包含了更为深刻的民间制度，即以礼俗、民俗、风俗形态出现的见之于动作的行为模式。这种由人类在社会实践，尤其是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性定势，往往具有很大的约束力，甚至官方的制度在它面前往往也表现出极大的无力感。一个时代的文化既集中体现于该时代的思想理论体系，却也广泛地展现于当时的各种社会风尚。因此也有人将其界

定为介乎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之间的行为文化层。当然也还是可以将它视为一种制度,一种没有用文字规范,也没有固定明确的执行机构,但却具有更自觉约束力的制度。

闽南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没有独立于大系统之外的制度,但是,它却有着极其丰富的以礼俗、民俗、信俗形态出现的,没有文字规范,也没有固定明确执行机构,但却具有更自觉约束力的民间制度。即人们常说的闽南民俗、闽南民间信仰信俗。

在文化结构模式的内层,就是人类在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长期积淀孕育而出的精神文化,或者称之为心态文化。

心态文化又有浅层心态文化和深层心态文化。浅层心态文化指的是经由文化专门家创作加工,注入丰富个性色彩的种种社会意识形态,如各种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及文学、艺术思潮等。浅层心态文化基本上都是已经比较完整地物化为文字、著作,存在于人们的意识思维活动中。

深层心态文化则是由历史长期积淀,缓缓形成,潜藏于大众生活中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这是一种感性直觉的“潜意识”或“集体无意识”,难以被自觉把握和运作,从而具有顽强的稳定性和延续力,与社会生产力和制度制度的变更也不一定形成直接而迅速的对应效应,历时悠

远而情致不衰。这就是文化的核心要素，或称之为“民族性格”。

闽南文化在其浅层心态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如包含了俗语、谚语、掌故、传说等等的口传文学，包含了戏曲、音乐、曲艺、舞蹈、美术等等的民间艺术，以及民间医药等等。

作为中华文化子系统，闽南文化的核心要素，就是中华文化核心要素。闽南人在承继以纲常观念为基干的传统伦理道德上是极其认真和彻底的。朱熹之所以产生于闽南，绝不是偶然的。与此同时，同广东人、潮汕人一样，面对大海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悠久的远洋通商传统，闽南人的思想性格中较之长江、黄河中、上游的族群，更具开放性。

综上所述，闽南文化的内涵，大致包括如下九个方面：

闽南方言、闽南物质生活文化、闽南民俗、闽南民间信仰信俗、闽南口传文学、闽南民间艺术、闽南民间工艺、闽南民间医药和闽南人的思想性格特征。

在简要了解闽南文化的历史和内涵之后，相信读者都会同我们一样，感慨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感慨作为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的闽南文化风韵独具、绵延四海，成为祖国与台湾、与东南亚华族不可分割的精神纽带。同时也会承认，过去我们对闽南文化的关注、了解和研究，

实在是太少太少了。当然，无论漳、泉、厦或是台湾、东南亚，都有许多先贤致力于闽南文化的资料搜集与研究，并做出了杰出的成绩。如谢云声先生的民谣、民俗研究，如泉州历史文化的研究，如台湾林再复的《闽南人》，如新加坡博物馆对华族历史的研究等等。然而从文化学的角度，观照整个文化区域，全面、完整、深入地对闽南文化展开研究，以期建立闽南文化学的理论架构，却还在期望之中。

而厦门，从地理上看，位于闽南的漳、泉、厦金三角和闽南、台湾、东南亚这个大三角的交汇点；从历史上看，乃是闽南人过台湾、下南洋的出发地和返乡祭祖的归航处；从现实上看，厦门特区已成为闽南乃至福建的经济龙头，又是对台、对外的经贸交流热点，其成为闽南文化区域的枢纽和中心，具有充分的条件和可能。厦门市政协正是据此建言，而市政府则果断决策，于1998年批准成立“闽南文化研究所”，使这一工作终于结束了游兵散勇各自为战的游击状态，而有了“正规军”。这不仅是厦门人的幸事，也是所有闽南人的幸事。

当然，一切研究从资料开始。我们一方面着手展开全区域的田野调查，一方面着手广泛征集相关资料。其中重要的资料拟刊印或重版，以期有更多的同志关注这项工作或利用这些资料展开研究。因此有了这套《闽南文化资料丛书》。因为我们

非常清楚,闽南文化的研究,非我们所独专。这是一项需要无数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努力,需要所有闽南人共同关注的事业。

作为闽南文化研究所,我们充分意识到这一历史责任的重量,唯有奋不顾身又战战兢兢去努力。

厦门市闽南文化研究所

一九九九年九月九日

①陈碧笙主编《南洋华侨史》P235、P238、P239,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9 年出版。

重印谢云声先生《闽歌甲集》序

陈 耕^①

去年七月市政府批准“厦门市台湾艺术研究所”加挂“闽南文化研究所”的牌，以大力推展流播于闽南、台湾及东南亚华侨、华裔聚居地的闽南文化的研究。李熙泰先生闻讯将他珍藏的谢云声先生的《闽歌甲集》、《台湾情歌集》等资料无私奉献本所。其对闽南文化的热爱真挚之情，令人感动。

谢云声先生(1907—1967)，字龙文，祖籍南安，自幼生长于厦门，毕业于厦门一中的前身“省立第十三中学”。后任厦门同文书院华文部史地教员，并兼任《江声报》、《厦声报》、《华侨报》、《思明日报》等报社副刊编辑部主任。他的国学基础深厚，书法造诣颇深。本世纪廿年代谢先生追随顾颉刚、钟敬文、容肇祖等，开展中国的民俗学研究，搜集资料，研究整理、编撰出版，并主持成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厦门分会。当时顾颉刚、周作人、赵景深、钟敬文、容肇祖等都应聘担任厦门分会的指导员，而姜子匡、罗香林、白寿彝、袁洪铭、朱自清等

则任该会的撰稿员。他们每周借《思明日报》的副刊发表《民俗周刊》，一气出了 50 多期，直到“九·一八”之后才停刊。同时又刊印民俗学丛书数十本。这本《闽歌甲集》就是其中最早的一本。

因此，我们今天重印谢云声先生《闽歌甲集》就有多重的意义。

首先，谢云声先生是我们厦门民俗学研究的先驱，也是中国最早投入民俗学研究的前辈之一。实际上，他也是我们闽南文化研究的先驱。在他与顾颉刚先生、钟敬文先生往来的信件及顾先生为他的《闽歌甲集》所作的序、钟先生为他的《台湾情歌集》所作的序中，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友谊，看出中国这两位民俗学大师当时对谢云声先生研究工作的评价。这样一位杰出的文化人士，做了如此大量的闽南文化研究工作，实在值得我们后辈纪念，而最好的纪念方法就是重印他快要失传的著述。

其次，《闽歌甲集》所搜集的这些闽南歌谣，对于今天的闽南文化研究有着极其珍贵的学术价值。我们的先辈一代代传唱的歌谣，到了今天，有几个人还记得？更不用说传唱了。老实说，就是如笔者年过半百的人也记不住几首了。这些曲折而真实地反映了先辈生活的口传文学，幸好有谢云声的《闽歌甲集》让我们记住了。我们于是知道，我们的爷爷奶奶是唱着什么儿歌长大，哼着什么歌

谣过日子。然后,我们可以拿它和现在的民间歌谣相比较,如八十年代出版的《厦门民间歌谣集成》。于是,我们就能发现在20世纪里,闽南的民谣,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还可以拿它和台湾的民谣比较和新加坡的闽南民谣比较,总之,我们有了一个八十多年前的真实的参照,它在学术上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再次,在《闽歌甲集》的字里行间体现出来的谢云声先生勤谨的学术精神,无疑是后人榜样。顾颉刚先生在《序》中提到:“在我们印出的民俗丛书中,谢云声先生的贡献最多。半年之内,他寄来了整理完工的台湾情歌二百首,闽南歌谣二百五十首。他又正在搜集福建省的风俗、故事、谜语、谚语。如果各省区中都能有像他这样的人三四位,十年之内一定可以编成一部很完全的《中华民俗志》了。”其对谢云声先生勤奋作风的赞誉溢于言表。再看所搜集的歌谣,仅“月光光”就有九首之多,有通行漳州、泉州、龙岩,还有通行永定、上杭等地。其中通行南安、惠安的与通行泉州的不同之处,又专门做了注释。这种严谨的作风在书中随处可见,而他在田野调查中所付出的艰辛努力,也可见一斑!

不过百里,原属闽土,前清光绪二十一年(民国纪元前十七年)以马关条约,割归日本,人口统计约三百万,自十二万蕃族,八万日本人以外,概为我们华人,尤其是福建人占居多数,语言大都通行福建漳泉二州。因此这集虽是闽歌,但遇台湾的歌谣,有与福建相类或连带着的,我亦尽量选入”。可见即使在日据台湾时期,先人也认定闽台一家,歌谣概同、文化概同。谢云声先生这本书,可做文化史实之证也!

九九年九月十八日

①陈耕,厦门市闽南文化研究所所长。